

历史·观念·文本

——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

孟庆澍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历史·观念·文本

——陈寅恪与钱宾四的清华经历

王德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SHI GUANNIAN WENBEN

历史·观念·文本

——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

孟庆澍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孟庆澍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649-0286-5

I. ①历… II. ①孟…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3003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谢 廓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郑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33.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孟庆澍，1975年生，河南省汤阴县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庆澍印象

——《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

思问录》小引

九月的北方，真可谓秋高气爽，风景不仅宜人而且简直有点招人。疏懒如我者亦不免受到感染，索性把工作间从封闭狭仄的书房暂移到比较敞亮的北阳台上，照例地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枝烟，然后打开笔记本，思谋着给庆澍的这本著作写几句话。时间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光景，旭日临轩，清风徐来，心旷神怡之中，不禁想起了那几句非常著名的语录：“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四十多年前我上小学时，这段语录是语文课文的一篇，所以曾经背得很熟，然而时过境迁，忘在脑后也有好多年了，不料今天却因庆澍而重新记起。这颇有点“意识流”的意味，而分析起来则未必无理可循：虽然庆澍早在六年前当了博士，三年前做了父亲，可是我记忆中的他却似乎永远定格为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总是那样的朝气蓬勃、干练明快、茁壮向上，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托大点说，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庆澍学术成长的人之一。1990年代初，庆澍正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那时的我也已返回自己的那所母校工作；随后的1996～1999年间，庆澍又继续在河大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我给他们那一届同学上过课，和庆澍也就更熟悉了；2000年我调到清华工作，庆澍则于次年来到北师大从王富仁先生读博，期间也常来清华园聊天，交流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学生时代的庆澍真是个茁壮成长的小伙子，为人特别爽快笃实，没有一般文学青年的文弱之气和客套劲儿，让吃饭就大口吃饭，叫干活就卖力干活；而最让我欣赏的，乃是他自然而然地把青春的朝气转化为学术上的锐气和闯劲，常常不知忌讳地敢想敏感问题，不畏艰难地敢碰学术难题，与师友们讨

论起问题来也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著劲儿。这是一般来自基层、就读普通院校的同学比较欠缺的气质，也是年轻时期的我所没有的素质，所以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性格气质或许与其家乡的历史传统以及家庭的成长环境有关吧。庆澍是河南汤阴人，那里是岳飞故里，庆澍自己也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他在这样的传统和家庭里受到熏陶，养成干练明快、刚健笃实和知难而进的性格，并转化为求学为文上的锐气与闯劲，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么？这种锐气和闯劲在庆澍的两篇学位论文中有突出的表现。他的硕士论文选题是《论胡秋原的文艺思想》。这在当时是一个不仅难度较大而且不无冒险性的选题，庆澍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敏感课题，并且在写作和答辩的时候敢于据理力争，显示出难得的学术锐气和论辩能力。这篇论文的核心部分随后修改发表了，现在已成为这一课题上常被征引的参考文献，其全文则第一次完整地收入本书。庆澍随后的博士论文选题《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也同样是个让那时的大多数研究者绕道而行的难题，而他却从史料的发掘和理论的分析两个方面，对这个学术难题做出了显著的推进，这篇论文在2006年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被誉为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创获。

庆澍干练明快、笃实认真的性格甚至也影响到他的文字表达。看他的论著，不论涉及多么复杂的问题，具有多大的理论难度或者牵连到多么繁复的文献，在表达上却都给人干净明快之感。当然，庆澍也援引理论，但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而绝不搞无谓的理论装饰或流行的洋八股调；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但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做逞臆曲解之论和过度发挥的阐释。像关于“自由人”胡秋原的论争那样极为复杂夹缠的问题，庆澍能在不算很长的篇幅里，作出那样中肯清爽的分析，至今读来入情入理，几乎让人难以相信那是出于一个年轻的硕士生之手的学术习作。同样，庆澍也一直很重视文献的搜集和辨证，为文笃实认真，但绝不搞繁琐的考证或堆砌的博学。记得几年前他为了考证误收在《章士钊全集》中的一篇小说《绿波传》的作者，曾四处追踪线索直到南通市的图书馆，终于搞清楚了曲折的原委，最后却只用了短短三四千字，就把问题交代得一清二楚。即使不远万里赴美访学，他也摒绝

浮华的观摩，一头扎进彼邦的旧报刊中，穷究中国现代作家在那时美国的行迹，撰写出了《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骆驼祥子〉在战后美国文坛（1945～1946）》这样笃实认真的论文，使这个一向为学界津津乐道却长期含糊其辞的文学跨国旅行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原原本本的认真梳理和翔实分析。应该说，治学的笃实认真和为文的干净明快，既是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也反映着一个人做人的认真性、踏实度和思想的逻辑性、分寸感。庆澍在这些方面的出色表现，让我再次体会到“文如其人”的意义。

记得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第二十六首里曾提醒人们，所谓熟悉也会成为认识的遮蔽，就在人们熟悉的身边何尝没有待发现的陌生存在——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时抚摩自己的发肤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想想也是，或许正由于自以为太熟悉了，我们对所熟悉的人事之认识反而容易局限于熟悉的方面，而不免忽视了另外的方面也未可知。也因此，有一天突然从自己熟悉的友朋那里发现了一些有所不知的东西，就让人格外欣喜地体验到发现的快乐。我对庆澍亦有此感。以上所说庆澍为人为文的一些特点，也只限于我所熟知的方面。其实，即使作为相熟的师友，我对庆澍的认识也是有所蔽的，也因此，此次翻阅他的这本论著，颇有出乎意料的新发现。

比如，以前我只知道庆澍一直专心致志于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从未想过他也对当今的作家作品以及电影很感兴趣，曾经写过不少评论。本书第五章的三篇文字就都是谈当代文学的，其中论汪曾祺一篇，更早在他读硕士期间写出，里面还涉及我的学术习作，我却全然不知。今日

补看庆澍早年的这篇评论,显然旨在挑战当时所谓汪曾祺仙风道骨的流行见解,而特别强调了汪氏得自儒家传统的蔼然仁者之气,并认为他的仁爱乃是以抒情而非说教的方式表现,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抒情现实主义”的风格。这无疑是符合汪曾祺其人其文实际的论断。看得出来,庆澍的这篇清新温情的评论也间接地反映了他自己性格中温柔抒情的一面,并且折射着他对乡土中国人情传统的系恋。再如本书的前两章,可能是庆澍最近的研究成果,我也是首次读到,其卓特的问题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非比寻常的深度,令人刮目相看。严格说来,这两章处理的都是学界比较熟悉的研究课题,难得的是庆澍的再开掘确有别开生面的新发现。第一章《两份杂志 一段传奇》,乃是借《甲寅》与《新青年》的关系来具体考察新文学缘何而来的大问题。这两个刊物当然并非罕见,与此相关的新文学起源问题也不断有人探讨,然则庆澍的重探究竟从何着眼和着手呢?对此,他在文章的开篇即清楚地说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问题意识——

众所周知,章士钊的《甲寅》杂志(1914~1915)与《新青年》颇有渊源,胡适的一句“同是曾开风气人”,道出了两家杂志在民初思想文化发展脉络中承前启后的密切关系。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发刊宗旨、编辑思路、栏目设置、刊物风格、政治理念等角度,对《甲寅》与《新青年》之间的传承关系多有论述,其中不乏洞见。然而,这些研究均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个历史的吊诡之处:为何同一时期的两家刊物,同样会聚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作者,创立在前的《甲寅》并没有提出新文学的主张?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两家刊物之差异,指出它们虽然同为带有启蒙色彩的综合性刊物,且作者群多有重合,但《新青年》从创刊伊始便具有自己的独到思路,而胡适的从边缘走向中心,则推动《新青年》逐渐摆脱《甲寅》的办刊模式,完成了向新文化运动舆论载体的转型。

正是这种瞩目于同中求异的独特问题意识,使庆澍将《甲寅》与《新青年》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紧接着的第二章更推而广

之，将研究的目标指向整个近代报刊，这也是近些年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庆澍没有作泛泛之论；他敏锐地从古典清议与现代舆论的区别着眼，提出了“作为舆论事件的新文化运动”的命题，从而提纲挈领、纵深开掘，新见迭出，令人豁然开朗。就我所见，这两章是近年来关于近代媒体与新文化新文学关系研究中颇具历史识见和理论深度的论文，其间广泛地涉及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现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公共舆论机制的建立等重大问题，实在是很难把握也很容易跑题的，而庆澍的思路可谓放得开而又收得拢，在纷繁复杂中始终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并恰当运用跨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来解说文学史的难题。读这两篇长文，我深切地感觉到近来庆澍的为文在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新锐之气外，又显著增加了一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成熟风度。

其实，成熟的迹象不仅表现在为文的渐趋从容裕如，更体现为历史思考的能够见微知著。从庆澍的近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充斥于学界的那些过满过甚的历史大判断特别警惕，而对历史的具体性、历史细节的意义以至历史的偶然性则颇为留意。仍以本书第一章《两份杂志 一段传奇》为例，该章不仅借《甲寅》与《新青年》关系的考论，将新文学缘何而来的宏大叙事具体化，而且不惜笔墨，特别申述了陈独秀、胡适之偶然遇合的决定性作用——

《甲寅》与《新青年》的文学在时间上前后接踵，面目却迥然不同，个中原因众多，自然难以缕述。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一个看似偶然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就是胡适在这两份刊物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由于《甲寅》的停刊，胡适计划中的译作未及发表，而且主编章士钊对他“不务正业”、热衷西洋文学似乎也不以为然，因此胡适在《甲寅》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当胡适因为向《甲寅》投稿的经历而结识陈独秀后，却借助《新青年》大放光芒，而新文学的洪流也从此出发。胡适使白话问题成为《新青年》的讨论焦点，进而催生了新文学运动。陈独秀虽然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他对白话文的认识远没有胡适系统而有条理——他的优势在于曾经办过白话

报,而且当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之后,敏锐地对白话给予充分肯定。在与《甲寅》擦肩而过之后,胡适的才华在《新青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某种意义上,他改变了《新青年》,从而也撬动了中国文学的历史转折点。这一段传奇经历,由于当事人的自我叙述与文学史家的反复追认,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而细细追究其个中缘由,却不能不说与刊物主事者的文学趣味大有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人们,只有将更多看似琐碎的历史细节纳入研究的视野,人们才能更深入、准确而体贴地理解,在清末民初昏晓未割、新旧杂陈的混沌时刻,新文学与新文化究竟缘何而来。

当然,偶然的成功其实并不偶然。所以文章紧接着说到吴虞的遭遇时,庆澍便借机对偶然的机缘与历史的必然之关系作了这样的具体解说——

由此视之,杂志的崛起与作者的走红,背后固然有其历史规律,但有时也不能不说是出于某些偶然的机缘。不过,阴差阳错之中其实又有必然:发现吴虞这样有潜力的作者,离不开章士钊作为资深编辑所具有的敏感和眼力;而《甲寅》“排孔而尊耶”的文化立场,在筛选读者的同时也在筛选着作者,它对志同道合的作者有强烈的吸附和聚集效应,从而奠定了《新青年》作者队伍的雏形。

……有意思的是,由于陈独秀的存在,《甲寅》时期萌发的这种人际联系在章士钊淡出之后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新青年》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无须讳言,多年来学界在讨论中国文化和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这类大问题、大事变时,总是乐此不疲地希望证成这样那样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规律、普遍性或必然性——从过去的“革命”到今天的“现代性”就曾先后被推崇为不可抗拒的普遍性历史大势。这种大判断往往诱使研究者在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大势之后忘乎所以地把话说满说尽,而常常忽视了历史发展其实是很具体很复杂的过程,甚至充满了偶

然性。我自己在研究和写作中也常犯笼统推论之病，所以看到年轻的庆澍对历史大叙事、大判断保持警惕，对历史细节、历史偶然性再三致意，确是既欣且愧，深受启发。但愿热闹的学界能多几个像庆澍这样审问慎思的人。

孔子曾提醒为学之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弟子子夏又强调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中庸》复将为学次第总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老话大家都知道也常常说道，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庆澍把自己的这部论著题名为《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或者有取于先贤的忠告以自策励之意吧。事实上，这部凝结了庆澍十多年学术心血的论著，已足以证明他是个笃行实践者，此所以难得也。当然，庆澍尚须努力，那是自不待言的——他今年才35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人生的和学术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然则好自为之，成就何可限量？

时值中秋，自朝至夕，一边欣赏着良辰美景，一边翻读庆澍的这部论著，诚可谓赏心乐事与共，欣慰感慨俱来，随手笔记，不过十一，复检一过，颇觉零乱无当于序，那就聊为小引吧。

解志熙

2010年中秋节草于清华园北之聊寄堂

目 录

庆澍印象

——《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

小引 解志熙(1)

第一章 两份杂志 一段传奇 (1)

一、《甲寅》杂志小考 (1)

二、新文学缘何而来

——从《新青年》与《甲寅》杂志的差异说起 (10)

三、在“曾开风气”之外

——《甲寅》与《新青年》渊源新论 (20)

第二章 作为舆论事件的新文化运动 (33)

一、报刊、学堂与租界

——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舆论 (33)

二、从清议到舆论

——清末民初公共意见的近代转型 (51)

三、公共领域、政论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发轫 (84)

第三章 观念的激流 (103)

一、观念之争的背后

——翻译与五四文体新秩序的建立 (103)

二、胡秋原与左联的论战 (110)

三、“自由人”的文艺思想 (119)

四、“第三种人”与左翼文学的复杂性 (144)

第四章 历史的碎影	(153)
一、《绿波传》索隐	(153)
二、关于周作人的《闲话并耕》	(158)
三、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 ——《骆驼祥子》在战后美国文坛(1945~1946)	(163)
第五章 文本的言说	(195)
一、仁爱与抒情 ——汪曾祺的气质	(195)
二、知识分子及其问题 ——谈谈《风雅颂》	(208)
三、生命不息 犹如喷泉 ——莫言《蛙》三题	(218)
附 录	(227)
一、世界舞台上的民族主义	(227)
二、穿越边界的历史追寻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读后	(232)
三、大历史与小人物 ——略谈《十月围城》的历史观	(241)
参考书目	(247)
后 记	(255)

第一章 两份杂志 一段传奇

一、《甲寅》杂志小考

晚清至五四，以《时务报》、《清议报》、《苏报》、《新民丛报》等近代报刊为代表的政论杂志逐渐兴起并成为杂志出版的主流。胡适曾断言：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①

姑且不论胡适的评价是否恰切，只看他选择的这五家杂志，除了《新青年》有一段时间偏重于“学术思想艺文”的鼓吹，几乎全都是道地的政论刊物。即使是《新青年》，以它前期和后期的表现来看，也不能不算是政论性的杂志。政论杂志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清末民初政论杂志的发展历程，约略分来，大致可断为三个时期：维新运动时期、海外笔战时期与民国成立之后。它的日渐发达，自有难以缕述的历史与现实的动因。要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不存在西方式的超然中立的政论杂志，政论刊物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其兴衰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因此，尽管一些政论杂志的影响已远远

^① 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后同，不另出注），第400页。

超出政治层面,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思想事件,但要探寻它的诞生,便不能不首先顾及它所处的政治环境。

1913~1914年间,正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政府扫除异己、独揽大权,不仅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而且将进步党弃若敝屣,瓦解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第一流内阁”,使国内“成为北洋军阀官僚的独占舞台”。^① 高压之下,大批国民党人流亡海外。章士钊虽不是国民党人,但因参与二次革命,也不得不携妇将雏,再次“违难”东京。^② 此时,处于低谷的国民党可谓困难重重:外有袁世凯政府威逼利诱、分化瓦解,拉拢了胡瑛等一批老党人背叛革命;内部则矛盾激化、歧见迭出,孙中山与黄兴之间意见不同,日趋公开化。《甲寅》杂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问世的。

关于《甲寅》的创刊,多年之后章士钊曾有这样的回忆:

余在东京,创刊《甲寅》杂志,人谤之曰:此黄克强私人喉舌也,或又曰:此欧事研究会宣传机关。实则此志伊始,为胡汉民所发起(有克强与余一札,证实此事,别有记载)。以余非同盟会会员,亦非国民党党员,顾鼓吹革命,资格颇老,对孙、黄相当尊重,无甚轩轻,此时主办此志,应最合宜,尔时同人之公言如是。^③

按说章士钊一手创办了《甲寅》,其回忆应有颇高之可信度,实则这段回忆颇有语焉不详之处。

首先,黄兴致章士钊一信收在《黄兴集》。从中可知,虽孙、黄意见不同,但为顾全大局,黄兴仍愿与孙中山派合作,由孙派的胡汉民动议,邀请非国民党人的章士钊共创国民党机关刊物,而章士钊因与国民党

①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② 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又见袁景华:《章士钊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后同,不另出注),第74~75页。

③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后同,不另出注),第282页。